

WENXUE DILIXUE

文学地理学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集

曾大兴 夏汉宁 高人雄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曾大兴 夏汉宁 高人雄 主编

WENXUE DILIXUE

文学地理学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集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

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

合编

2206
195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集/曾大兴，夏汉宁，高人雄主编.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 8

ISBN 978 - 7 - 306 - 05384 - 8

I. ①文… II. ①曾… ②夏… ③高… III. ①中国文学—地理学—文集
IV. ①I2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7902 号

出版人：徐 劲

策划编辑：曾一达

责任编辑：曾一达

封面设计：林绵华

责任校对：廖丽玲

责任技编：黄少伟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编辑部 020 - 84110283,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510275

传 真：020 - 84036565

网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 × 960mm 1/16 27 印张 513 千字

版次印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1000 册 定 价：6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

- 文学地理学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梁勇)/1
关注“丝绸之路文学景观带”(曾大兴)/3
文学地理学必须揭示文学地理的一般规律(朱寿桐)/6
文学地理学学科创建的原因、意义及关键问题(陈一军)/8

文学地理学基本理论研究

- 文学与气候之关系研究
——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机制和主要表现(曾大兴)/19
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四个术语及其内涵简说(邹建军)/48
两个文学地理学?
——试论中国文学地理学的文学面与地理面(戴俊骋)/56

文学景观研究

- 虚构性文学景观研究价值初探(王姮)/65
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
——东汉京都赋中长安与洛阳的形象比较(王柳芳)/73
易水文学景观研究(魏玮 蔡丹)/84
“临洮”意象内涵发微(连振波 李富强 贾伟)/95
论许承祖《西湖渔唱》的景观文化意义(宋雪玲)/104
瓦尔登湖文学景观(白阳明)/114

竹枝词研究

- 上海竹枝词描写的接财神习俗
——兼谈文人竹枝词的民俗价值(黄景春)/119
广阔迷人的民族风情画卷
——论舒位《黔苗竹枝词》的丰富内容与艺术特点(石天飞)/126

西北文学地理

- 北周本土文学意义探讨(高人雄)/137
秦简中的应用文体(延娟芹)/144
陇右地域文化对唐诗创作的影响(王忠禄)/154
岑参的西域行旅与“丝路”之作(杨晓霭 高震)/162
敦煌佚名组诗六十首的地域特征及文学情思(王志鹏)/173
元西域散文家及其散文的民族特质(王树林 史挥戈)/184
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家族研究的现状与任务(多洛肯)/198
论王蓬文化游记散文的空间
——文本空间分析的一个尝试(火源)/203
-

北方文学地理

- 李益边塞诗中的唐代中国北疆(高建新)/212
地域文化与元代北方文学家族(张建伟)/223
卫拉特蒙古民歌中马的色泽相貌初探
——以红、棕、花红、海骝、豹花、灰白、斑白、褐色的马为例
(额尔登别力格)/232
乐亭史氏家风述略
——以《萱庭寿言二编》为例(王双)/241
古代邢地文学研究(胡蓉)/252
-

齐鲁文学地理

- 雍容舒缓歌大风
——《诗·齐风》语言的地域性研究之一(唐旭东)/264
从元代水浒戏看梁山泊文学地理形态之演进(吴宪贞)/273
-

荆楚文学地理

- 对神圣性精神家园的诗意期待
——荆楚巫祭文化与屈原的神秘主义书写(李措吉)/280
《全宋文》《全宋诗》失收及误收的江西作家与作品补订(刘双琴)/290
湘西原始宗教与沈从文的文学感悟(肖向明)/300
-

岭南文学地理

- 唐宋历史地理与诗歌地理中的岭南(侯艳)/310

论地域环境与刘克庄入桂诗的精神世界(张炜)/321
怀旧式书写与广州城市文化身份的再造(李俏梅)/330

国际视野

14 世纪日中韩三国的汉诗对话

——以清拙正澄(中)·李齐贤(韩)·绝海中津(日)为例(海村惟一)/341

关于中国接受村上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

——以村上文学中译本的流行状况为例(海村佳惟)/357

林罗山与朝鲜通信使的文学对话

——以江户文豪林罗山《和秋潭扶桑壮游一百五十韵并序》为例
(陈秋萍)/378

许世旭先生的文学地理学初探(朴南用 郑元大)/390

运用文学旅行 content 的韩中出版文化交流研究(李永求 姜小罗)/398

李齐贤的中国纪行词考察(金贤珠 金瑛美)/411

学科建设动态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在西北民族大学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报》)/419

文学地理学：追寻文学存在的根脉(《中国社会科学报》)/420

百余名专家甘肃探讨“丝路”文学欲推动非遗保护(《中国新闻网》)/423

文学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召开：首提“丝绸之路文学景观带”

(《人民网》)/424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年会提出“丝绸之路文学景观带”新概念

(《兰州日报》)/425

让文学地理学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唐山劳动日报》)/426

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

文学地理学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梁 勇

自2011年12月首届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在江西南昌举办以来，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2012年第二届年会在广州大学举办，2013年年会又移师到南昌。今天，第四届中国文学地理学年会又在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兰州，在文化学术氛围浓郁的西北民族大学顺利召开。在此，我谨代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向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回顾四届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年会，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宋代文学重点学科团队都是积极的倡导者、参与者、推动者和践行者。我们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宋代文学重点学科团队，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中，也做了不少扎实的基础研究工作，出了一些成果，如《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研究》，等等。最近，又有一项新的研究成果《宋代江西文学家地图》正式出版。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举办四年来，我们欣喜地发现：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逐年壮大。去年在南昌召开的第三届文学地理学会年会的专家学者有120余人。据了解，今年的兰州年会，报名参加年会的专家学者有225人，来自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已收到的139篇论文来看，专家学者们不仅对文学地理学研究充满着热情和激情，而且在研究领域方面也有较大的拓展，既有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研究，又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地理研究，还有外国文学地理研究等。由此也可以看到，文学地理学的理论魅力和影响力。

当然，文学地理学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这也预示着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路要走，还有许多难题需要我们去深入探讨。比如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作家出生地、宦游地、贬谪地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文学中心转移等问题，

都有待我们一一破解。最后，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梁勇：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关注“丝绸之路文学景观带”

曾大兴

2013年11月28日，也就是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三届年会召开的前一天，高人雄教授在兰州给我打电话，表示愿意承办第四届年会。高教授特别强调：“研究中国文学地理，不可不来西北。”2014年3月23日和5月19日，高教授先后发出第四届年会的《预邀请函》和《正式邀请函》，一再强调“西北地域民族文化与文学地理学研究关系密切”。

高教授为什么要一再强调西北与中国文学地理的关系密切呢？我做了一点思考。我的体会有两点：第一，不来西北，不知中国文学版图之大；第二，不来西北，不知丝绸之路文学景观之多。

先说第一点。“西北”这个名称，如果从行政区划的意义上讲，也就是从功能文化区的意义上讲，是指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这五个省（自治区），它的面积有310.97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版图的32.39%，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一的中国陆地版图。如果从区域文学地理的意义上讲，也就是从形式文化区的意义上讲，是指内蒙古中西部、宁夏、甘肃和新疆，它的面积是268.78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版图的28%，也超过了四分之一的中国陆地版图。大家想一想，西北文学版图有多大？可以说是一望无际。然而一望无际的西北文学版图，也只是中国文学版图的四分之一多一点。那么，中国文学版图又有多大？所以我说：不来西北，不知中国文学版图之大。

再说第二点。2014年6月22日，也就是我们这个会议开幕前的22天，在卡塔尔的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由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再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西汉时开辟的丝绸之路，在东汉时往东延伸至洛阳，所以这一次的“丝绸之路申遗名单”中，中国境内有22处申遗点，其中河南4处，陕西7处，甘肃5处，新疆6处。这22处申遗点都是著名的文化景观，这22处著名的文化景观与文学地理学所讲的文学景观有重合的，也有不重合的。重合的有11处，这11处景观是：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麦积山石窟、玉门关遗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北庭故城遗址。也就是说，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22处著名的文化景观，有11处同时也是文学景观，文学景观占了一半。

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由洛阳、长安到玉门关、阳关，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西段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丝绸之路的东段和中段都在中国境内。实际上，在丝绸之路的东段和中段，著名的文学景观远远不只这 11 处，至少也有 30 处，仅仅是在甘肃境内就有 10 多处。像大家耳熟能详、向往已久的安定城楼，成县杜甫草堂、麦积山、陇山、凉州城、焉支山、祁连山、酒泉、嘉峪关、阳关、玉门关、敦煌等，就都在甘肃境内；还有北庭故城遗址（也就是岑参的边塞诗所写的轮台）、吴承恩所写的《西游记》火焰山，王昌龄等人多次写到的楼兰故城遗址等，则都在新疆境内。我曾经对中国境内的著名文学景观做过一个初步的统计，根据我的统计，中国境内的著名文学景观有 158 处，其中在丝绸之路上的就有 30 处，占总数的 19%，将近五分之一。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不是单一的，它们由东向西，迤迤延伸，构成了一个文学景观带，或者说是一个文学遗产廊道。所以我说：不来西北，不知丝绸之路文学景观之多。

所谓文学景观，就是与文学关系密切的景观，它们是景观的一种，但是比普通的景观多了一份文学的色彩与内涵。文学景观的魅力是巨大的，它的魅力源于文学。汉唐时巍峨壮观的阳关和玉门关，在今天看来不过是风蚀雨剥之后并不起眼的一堆黄土，但是人们仍然不远千里万里来朝拜它们，原因就在于王维的“西出阳关无故人”与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等文学名句，激发了人们丰富的历史与地理的想象。如果没有这些经典名句的吸引，没有一份因文学而时时鼓荡的文化情怀，谁会冲风冒雪或顶着烈日骄阳，跋山涉水舟车劳顿地来到这荒凉的一隅？

文学景观在地理上依托于自然与人文景观，但是它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多由文学家和千千万万的文学欣赏者、旅游者所赋予。不一样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积累，不一样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甚至不一样的观赏时间和角度，都会赋予景观以不同的意义，因此文学景观的内涵非常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景观是人类文化的记忆库。你也说阳关，我也说阳关。阳关是军士们日夜把守的要塞，是信使们更换马匹的驿站，是商人们打尖歇脚的旅店，是游子们瞭望故乡的危楼，是思妇们怀念亲人的坐标，是诗人们抒情言志的意象，是后人追寻历史的符号……阳关累积了太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想象，当人们有了闲暇，就要来看看它，看看自己心中的阳关。

现在中、哈、吉三国的经济学界、政界、商界都在热议“丝绸之路经济带”，其实在丝绸之路上还有一个文学景观带，除了中国境内有大量的文学景观。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也有文学景观，例如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就有伟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文学景观的魅力是巨大的，文学景观的旅游价值也是巨大的。古往今来，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为沿线各地创造了

多少旅游价值？这恐怕是难以估计的。因此我建议，有关方面在讨论和制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规划的时候，能够充分考虑到“丝绸之路文学景观带”的价值。我认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文学地理学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这个作用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或地理学所能取代的。文学地理学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挖掘、研究和彰显丝绸之路的文学与文化内涵，这对于更好地保护、利用珍贵的文学与文化遗产，对于提高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和建设水平，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有关部门讨论和制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规划而不邀请文学地理学学者参与，恕我直言，这个规划是会有缺陷的。

我们这届年会有两个内容：首先是讨论文学地理学的有关问题，然后是考察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带。说到考察，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作为文学地理学的学者，我们的考察和普通旅游者的考察是不一样的。文学地理学强调田野调查，而且这个田野调查还不是单纯的田野调查，还得事先做一些文献的收集、考证与理论的研究。因此，我们在考察之前，一定要把会开好。要围绕我们的会议议题，联系西北文学地理，联系“丝绸之路文学景观”，进行深入的讨论，要有新观点、新视角、新材料的出现，要能解决若干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至少要提出若干问题。

最后，我要代表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感谢西北民族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和广州大学对这次会议的大力支持，感谢来自全国各地和日本、韩国的老中青三代文学地理学学者的亲自光临，感谢高人雄教授和她的团队为会议所做热情而周到的服务。预祝各位专家在会议和考察期间交流多多！收获多多！快乐多多！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曾大兴：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文学地理学必须揭示文学地理的一般规律

朱寿桐

近些年来，文学地理学研究形成一股热潮，甚至形成文学学术的某种时尚。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地理认知并不是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文学地理学所要求的框架内容要复杂得多。它的学术内涵和外延需要进行详细而缜密的论证，它需要框定属于自己的资料系统和理论系统，它需要阐明独特而可行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揭示文学地理的一般规律。

只有成功地揭示了相关规律性的内涵，学问的深度和学科的特征才能得到彰显与保证。文学的地理特征包括文学地域的风格差异，作为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可谓彰明较著，然而作为一种文学规律，则存在许多学术问题。一般而言，一定的地理条件，山川风貌，气候特征，会对长期活动在这一区域的文学家产生长久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会有较强烈的反映和较厚重的沉淀，这样的反映和沉淀会形成某种风格特征，那么这样的风格可谓文学和审美上的地缘风格。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在同一区域活动的文学家都会有同样的风格？文学家生活的地理空间和相应的自然环境，对其生命意识和生命感兴无疑会产生相当的影响，这是一种人文学的必然；而这种影响如果诉之于文学表现，则往往体现为文学表现的风格，风格的构成因人而异，其所涵容的主观性因素十分复杂，人文学的必然一般来说很难转化为风格学的必然。研究文学地理学需要非常谨慎地面对这种人文学与风格学的必然差异。

文学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其来源相当复杂，地缘因素和地理条件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因素，而且对于一些文学家来说，这方面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可能较为显著，可对另一部分文学家来说就可能较为潜隐。更为复杂的是，文人对某一地域山川风貌、气候特征的感受与表述，其强烈程度和频率往往并不是与他们在该地域生活的时间甚至体验的深度成正比，一个初来乍到的诗人面对从未目揽过的神异的群山或者从未亲临过的浩瀚的大海，其讴歌的热忱可能远远超过常住山间与海畔的文人。李白来自西北高寒地带，但对大海讴歌的热忱冠绝当时。文学家常常对陌生的地理风貌有一种难以阻挡的新鲜感和难以遏抑的歌唱欲，这其中可能包含着人类审美认知的一般原理：人们对空间物象的审美感受往往表现出趋异性，而对时间形态的审美感受则常常体现出认同性。忆旧的情结属于时间的感兴，面对时间维度，每个人都有回不去的故乡。一群人，一代人会拥有一个永久难以忘怀的集体记忆，特别是这样的集体记忆承载在特殊的声音之中，例如歌曲，便很容易唤起这群人或这代人的集体认同感。然而

空间维度的情感反应就不会这样简单。人们熟悉的空间、地域与相关的风物固然能令人魂牵梦绕，但每当人们接触到他乡的风景，异地的景致，特别是那种至大至美的陌生景观，往往会形成巨大的审美冲击力，令人酣然久之而难以释怀，令人怦然心动而难以自持。如果是诗人或作家，会非常自然地将自己的笔墨浸入这陌生的空间，将自己的情愫倾注于这神奇的景象，其讴歌的力度或描写的频率可能会远远超过对他们故里俗景的文学表现。这对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就增加了许多困难与变数。文学地理学必须直面这样的困难与变数，在更加深蕴的理论开掘中解决这样的问题。

同时，在文学创作的构思环节，地理风貌等空间意象的占位又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异域、异地的风物景观可能会非常频繁地出现在文学和审美的表述之中，但一般不会对文学家的意象思维产生深刻的影响和长久的作用，能够产生这种影响和作用的地理风貌和物候现象只能是与特定文学家深刻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那些自然因素，包括该文学家长期濡染并置身其中的家乡风物与故地景观。现代著名诗人郭沫若的创作情形或可以说明这一点。郭沫若在 20 世纪 50 年代谈到自己 30 年前的早期创作时，矢口否认自己的山水构思与家乡的山川景象有关，认为基本上都是对日本九州博多湾的景象描写。如果从实景描写的角度而论，他的说法是可信的，因为他太醉心于博多湾的松原与大海，诗文写作常实写那里的风物景致。然而在进行虚拟性的意象构思与表现时，故乡峨眉山和乐山的秀丽雄壮会起到深刻的甚至为作者自己所浑然不觉的影响作用。在一篇题为《月光下》的小说中，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忏悔自己青年时期讲课的失误，便是将“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中的后一句误释为“莲叶多得像是一田一田的”。这种意象虚构显然并不基于海边或平原的博多湾，而是基于有着层层梯田的南方高山景象：那一块块梯田铺满着稻秧的碧绿在山腰中呈现，恰好能令人联想到一茎茎莲叶的摆舞。这种关于“田”的意象，在空间景象方面已经远离了平原地区硕大平展的农田，而深深印刻着南方山区远望如绿色叶片的梯田形貌。这种能够参与文学家意象构思的地理风物往往是深层地沉淀在文学家脑海中的桑梓元素或家乡景致，成熟的文学地理学应能揭示出这种深层的地理因素与作品表层的地理景观描写之间的复杂关系。

可能还有许多现象、规律和问题，需要成功的文学地理学拿出自己的理论，做出自己的阐释。审慎的学者如曾大兴等，也许意识到这些复杂现象和问题的存在，对文学地理学的学术和学科呈现持非常慎重的态度。然而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存在，只是引起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者更深入的研究兴趣，而不应该成为这一年轻的学术课题进一步开掘与生发的障碍。其实，这些现象和问题的揭示，无不来自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启发，而且主要是曾大兴学术成果的启发。

(朱寿桐：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文学地理学学科创建的原因、意义及关键问题

陈一军

—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从地理角度热心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在学界产生了不小反响。对于他们中的不少人而言，采用新的研究视角或方法倒在其次，首要的是建立一门新的学科。他们要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建立一门全新学科——文学地理学。当然，这不是一时冲动，实际上和近二三十年中国学界的学术动向、学术实践和学术累积相关。1986年，金克木发表学术随笔《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1]220-228}，中国大陆学术界从地理空间维度研究文学并谋求建立新学科的实践活动便有意地展开了。截至2011年，发表这一类型的各类论文达1093篇，出版相关著作多达234种。^①二三十年的时间积累了颇为丰富的学术成果。期间，胡阿祥等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过程中提出创建“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科的主张^{[2]174}，谋求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类似的努力同样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领域进行。于是，构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实践在中国文学研究诸领域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11月11日至14日，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广州大学中文系共同主办了首届中国文学地理学研讨会，并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标志着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进入了更加自觉的建设阶段。

2012年12月10日至12日，由广州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广州举行，除了大陆的众多学者，香港和澳门也有学者参加，日本、韩国的学者也加入进来，人数达到100多人，议论的中心是把文学地理学建设成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一门独立学科。^②进一步明确了文学地理学建设的学科属性和目标定位。2013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南昌召开，会议的

①该数据来源于李伟煌，曾大兴辑录整理的《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录索引》，其中出版著作数目实际截止日期为2012年。具体参看曾大兴，夏汉宁主编：《文学地理学》，342～4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②这是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广州大学文学院曾大兴教授的学术观点，显然，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人员的广泛赞同，遂成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具体论述参见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文学地理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载《江西社会科学》，2012（1）。

主办单位增加了,除了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广州大学和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在积极争取下也获得了主办资格。参会学者的数量相比第二届学术年会也有所增加,尤为重要的是这次参会人员的地域分布更加广泛,学科背景也更加多元化,出现了自然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现代地理信息系统向文学地理学学科输送营养和深度融合的态势。第三届年会深入探讨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和知识体系,梳理了文学地理学的中外学术史,谋求建立文学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切实把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14年7月13日至16日,“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在兰州召开,西北民族大学、广州大学、江西省社科院和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共同主办了这次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139篇,有来自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单从参会人数看,日本、韩国等外国学者参会的积极性也比往届更高),是历届年会中规模最大、代表性最强、学术成果最为丰硕的一次会议。^[3]这次会议的突出亮点是: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更加自觉和深入;文学地理学的个案研究扎实推进,西北多民族文学地理研究成为本届年会的焦点之一;文学景观被看作是未来几年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提出了“丝绸之路文学景观带”的概念,谋求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之间的融合;健全和完善文学地理学学会的组织机构。

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在中国学界已经深入推进,使得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现象。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别开生面的,就算放到世界学术史的序列中也颇为引人注目。

对于西方学术界而言,从地理空间维度研究文学现象其实是很早的事情。18世纪,德国批评家J·G·赫尔德在运用自然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评论文学作品时常常论及地理因素对文学的深刻影响。19世纪初期,法国著名学者斯达尔夫人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等著作中从地理环境角度研究欧洲文学,将其分为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深入探讨它们各自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对后来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后,法国史学家兼评论家丹纳在其文艺学名著《艺术哲学》中系统论述了“种族”、“环境”和“时代”对文艺的作用,牢固确立了包括地理因素在内的实证研究在文艺研究中的地位,直接促成了“文艺社会学”学科的建立。此后,在文艺社会学的发展中,文学的地理因素一直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被关注。但是,文学和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在这样的关注中被聚焦和放大,最终促成一门新的学科——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立。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学术史梳理来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立确实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了。

二

在世界现代学术史上，一门学科总是由西方人创建，中国学者仅仅是借鉴运用。现在，中国学者试图打破这一魔咒，破天荒由自己创建一门新学科——文学地理学，这实在是颇费思量、发人深省的。要知道，西方人很早就有这方面的学理准备。可是，就是在西方垄断现代学科体系建设背景下，中国学者高擎起创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旗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显然，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创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从前文有关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的简单梳理中，我们看到，在对待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问题上，中西学术界表现了不同的行为取向：西方学术界始终将其视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学术界却力促其成为一门学科。这便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可以想见，这种对照中必然包涵了中西方社会复杂的文化讯息，循此便可以深入到中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一方面，从文化的核心层面认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独特角度审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特性。

杨义、曾大兴、陶礼天、梅新林、邹建军等人可谓积极推动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代表人物。对于建立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曾大兴这样表露他的心迹：

就文学这个一级学科来讲，它的二级学科如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都是20世纪初期以来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只有文学地理这个二级学科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创造”。^{[4]5-13}

曾大兴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立的中国属性，这是中国学者渴望自己创建新的学科门类的心态表露。19世纪后期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压迫和冲击下，中国逐步吸收、采用、建立了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在民族性格的心灵深处，这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事实上，面对西方现代学科体系，中国学者内心一直存在着深深的压抑感。什么时候由中国人自己完全创建出一门学科来呢？这成为隐藏在中国学者灵魂深处的强烈呼唤。曾大兴等人终于在文学地理学这里找到了一个不错的突破口。于是，这些学者内心深深的压抑感终于有被疏散的感觉，在学科建立之初就迫不及待地表达出来。自然，这不只是曾大兴个人的心迹，而是压抑已久的中国学术界普遍心声的吐露；曾大兴有幸成为这一心声的代言人。所以，单就这一点而言，文学地理学学科建立的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表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吸纳、融会贯通，中国人终于到了独立自主创建学科的时候了。不管文学地理学学科未来的发展状况如何，仅仅凭借这一点，历史就会记住它。不过，仅凭一种心态是难以建立起一门学科的，

所以，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立还需要结合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特性，寻找创建这门学科所需要的其他条件，这就要求探寻中国文化自身的特殊性了。弄清楚这方面的问题，也就回答了西方人为什么没有能够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疑问。

中国文化是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奉行的是“实用理性”原则，“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不去探求、讨论、争辩抽象思辨的哲学问题。^{[5]34-35}换句话说，这种思维兼具实用主义的有用性和实证主义的靠近现实实际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中得到了充分表现。比如，东汉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就“以诗证地”，援引《诗经》中的某些篇章和诗句来佐证“故秦地”的自然人文环境，而南宋朱熹在《诗集传》里大量使用“以地证诗”的方法。^{[4]5-13}这些做法都在有意无意把文学作品往现实实存的层面靠拢。这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一个强大的传统。因此，单从注重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实践的人物就数不胜数，除了前面提到的两位，突出的还有南朝的刘勰、唐朝的魏征、明朝的胡应麟、清朝的沈德潜，等等。到了中国近现代，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王瑶等人也在继承这一传统；梁启超甚至明确提出了“文学地理”的概念。

所以，近些年中国学术界热衷于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表层与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治学方式存在紧密关系，深层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暗暗起作用的影响。文学地理学学科积极创建者邹建军这样规范他们所要建立的学科的属性：文学地理学的存在与发展，并不只在于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而主要在于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那就是文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这就要求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运用这样的方法：在文本解析中发现作品与地理相关的细节、元素，研究者要根据文本信息“实地考察”，并借用地理学“图表统计”的方法，等等。^{[6]21-27}这种诉求和班固、朱熹他们的做法在精神上何其相似，这实际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局中人对自身“实用理性”思维特性和实践追求的最清晰的展示。

反之，我们可以在对西方文化的观照中，追溯一下西方人在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研究方面的努力，借此发掘一下西方世界未能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原因。19世纪，西方在斯达尔夫人、丹纳等人的努力下，也由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创作的兴盛以及围绕这些创作所展开的文学批评的活跃，空前凸显了地理环境在文艺批评中的意义。但是，这一势头并没有持久保持下去，随着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消歇，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20世纪初期，形式主义批评在西方兴起，西方文艺评论界开始着重关注文学的内在形式问题，到了英美新批评流行的阶段，则明确主张文学批评要把文本的内部世界和外在环境区分开来。而结构主义批评一心着力于发掘文学文